

文化反抗与国家文化： 马来西亚华社民办文物馆构想的形成*

Cultural Resistance and National Cultur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ty Museums by the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吴小保**

(GOH Siew Poh)

摘要

民间文物馆近十多年来开始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兴起。有别于政府单位资助的官方藏馆，这些新进的文物馆多由华人会馆、基金会或者学校等民间单位筹建。它们的规模、形式、馆藏与叙事，皆因资金、承办单位或个别目的而异，素质也良莠不齐。民办文物馆是基于马来西亚特殊的历史缘由，例如国家对华社的长期边缘化与政策偏差，特别是1971年起开始实施的国家文化政策，而在华社中酝酿。为了抵抗国家主流叙事，或因自身身分认同的焦虑，或历史义务，华人社会发动起文化自强运动，民办文物馆最初的倡议与构想，就是在这样的政治低压氛围中提出，并慢慢地在华社中扎根与巩固。本文搜集相关史料文献，特别是新闻报导、特刊，整理马来西亚华社自1980年代以来提出的民办文物馆构想，并尝试就此中的历史意义作出分析。

关键词：华社、民办文物馆、文化反抗、国家文化

Abstract

A number of museums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the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se museums are fully funded and sponsored by Chinese organizations, foundations or schools. Depending on available resources, these museums differ in size, form,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ty museums may be traced to specific historical roots especially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Policy in 1971. Anxious over their identity and the urge to preserve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the Chinese community began setting up museums as a form of self-empowerment in a testing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community museums from the 1980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to the community. The main sources of

* 本文乃根据作者与邓婉晴合作完成的论文〈抵抗还是补遗？马来西亚雪隆华社民间文物馆历史与记忆展示初探〉（发表于2019年3月10日台湾新竹交通大学“2019文化研究第20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增补改写而成。本文内容除了附录（已注明）由邓婉晴整理，其余为作者个人的研究成果。

** 吴小保 华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电邮地址：gohsiewpoh@yahoo.com.sg

reference are derived from documents and records that appeared in local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published in Chinese.

Keywords: Chinese society, Chinese community museum, culture resistance, national culture

一、前言

马来西亚的博物馆自殖民地时期开始设立，原为殖民地统治意识形态服务。1957年独立以后，政府不断创设或扩建博物馆，并尝试在内容展示和叙事上，配合国族意识形态，因此也被视为马来人主权（Malay Supremacy）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机器。1971年，政府在五一三事件后制定国家文化政策（National Culture Policy）¹，对国内各族群文化造成深远影响，任何不符合该政策三大原则的元素都遭到排挤。如此一来，无论是马来人或非马来人的身影，在博物馆里都被客体化、污名化乃至被消音。²

基于官方博物馆对马来人以外的群体的忽视与偏颇，自1980年代起，民间华社就出现鼓吹成立华人文物馆³的呼吁，希望透过民间力量与国家历史论述进行抗衡。然而，当时的民办华人文物馆倡议却因各种缘由而好事多磨，要在千禧年前后才得以真正落实，各种不同类型的文物馆如雨后春笋般，在全马遍地开花。这种创办文物馆的趋势，有论者解读为是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化工程，其背后推动力来自华社对自身历史文化遭到国家边缘化的担忧（陈亚才 2010：65；《东方日报》，2016年10月24日）。这种观点也意味着，创办文物馆并非零散的或偶发的个别现象，背后有着共同的因素，推动着它往这个方向发展。

目前，学界对此民办文物馆现象的讨论似乎不多，其中最值得参考的是安焕然与何朝东编辑的《老东西也能跳舞：文物馆经营管理研讨会文集》（2010）。该书主要探讨文物馆的“管理学”，除此之外，也讨论了其他课题，包括文物馆的功能、定位与未来发展（丘如华，2010；叶联瑾，2010）、本地华人民间文物馆的分类（陈亚才，2010）与本地文物馆发展史记述（叶耿瑾，2010；林源福，2010）。当中也有一些文章述及华社民办文物馆风气的现象，比如陈亚才（2010：65）就视之为是自1980年代以来华社积极鼓吹与倡导的一项文化工程，然而陈氏的重点在于讨论“管理”，关于厘清“源头”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未对此作深入讨论。本文在此基础上，将就

¹ 1971年文化青年体育部在马来亚大学召开国家文化大会，会后拟定三大原则：一、马来西亚国家文化必须以本地区原住民文化为核心；二、其他合适与恰当的文化元素可考虑接受为国家文化；三、伊斯兰教是塑造国家文化重要元素。又指出，第二原则的合适与恰当必须以不违反第一与第三原则为前提，见Kementerian Kebudayaan, Belia dan Sukan（1973）。

² 详参Abu Talib Ahmad（2015），作者在书中引述了许多实例，证明全马的国立和州立博物馆都存在马来人以及伊斯兰教优先的叙事形态，这种叙事方式虽然在社会甚至马来进步、左翼圈内引起非议，但国家博物馆局都不愿直面或回应这些批评。

³ 本文采纳陈亚才（2010）的笼统用词，以“文物馆”泛指并非由官方筹建、资助、经营和管理的文化中心、纪念馆、文物室、陈列室、博物馆等展示空间。必须指出，这个界定仍显含糊，例如一些财团创办的文物馆似乎并不被部分华团视为华社民办文物馆。又比如，1998年成立的马华文学馆（收藏马华文学作品的图书馆）算不算笼统意义下的“文物馆”，这都可以再讨论。

以上所述的民办文物馆现象作出历史的、政治的探讨，透过史料文献的整理，回归历史源头，探索“民间文物馆”的构想如何在华社中形成、生根与演变。

二、宰制与回应：华社民办文物馆构想的形成

（一）三次兴办民间文物馆：集体性与造神

1969年五一三事件发生后，马来西亚进入政经文教的分水岭。政府自1970年代起着手推动土著主义政策，其中的国家文化政策对非马来人的历史文化，构成了制度性的边缘化，引发各种不满，特别是华社的反弹。为了捍卫自身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权益，华社开始推动各种文化的、群众的运动⁴。华社今日形成风气的民办文物馆，其早期构想正是在“国家-民间”二元框架与“宰制-回应”的模式中酝酿和形成。换言之，文物馆的“民办”意义，乃建立在与国家相对抗衡的格局。本节透过早年报刊与文献的考察，探索“华社民办文物馆”构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演变，并就其中的意义作出分析。

探问“华社中谁最早提议创办文物馆”并非本文的目的，因为这样的历史源头难以爬梳，而且难免挂一漏万⁵。相反，本文想厘清的是，从今日民办文物馆风气形成的文化现象或工程，回溯其精神上的历史源头。换言之，本文将它视为一种社会集体实践或行动，从资料的爬梳发现，其“民办”文物馆的精神源头可追溯到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以及华社对此作出的回应。而这样的倡议，最早可能来自属于执政集团的马华公会。

马华公会早在1981年提出要设立华人文化馆或文物馆。在这之前的1970年代，该党已积极地思考如何回应国家文化政策课题，包括举办华人文化大会、成立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1981年华人文化馆的倡议，是前述工作的延伸。不料，该倡议却引来马来社会的鞭挞，指责其反对国家文化政策的推行，犹有甚者认为其将导致种族分裂（*Utusan Malaysia*, 14 September 1981）。面对如此严厉指控，马华公会当时回应指出，创办文化馆的目的不是反对国家文化政策，反而是为了弥补该政策之种族性偏差，并进一步促进种族团结。当时全国马青总秘书周福泰在文告中指出：

马华这种非官方爱护母族文化的努力一点也不违反国家文化的建立，其实，马华之要成立华人文物馆，并不意味着马华要宣扬华人的文化遗产，而是因为华人的文化遗产在国家博物院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和反映，换句话说，若国家博物馆和文青体育部能合理公平地对待华人的文化，马华是没有理由要设立华人文物馆的。（《光华日报》，1981年9月17日）

⁴ 相关讨论颇多，值得参考的著作，见林开忠（1999）。

⁵ 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早在战前就有人倡议在中国海外设立文化馆，包括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地，以便收集、陈列世界各地华侨的生活状况、风土人情，并协助当地华侨子弟回国升学（《南洋商报》，1933年1月28日）。由于资料的缺乏，不确定当年的倡议是否有落实。在新加坡，早在1972年已创设南洋大学李光前文物馆，该馆获得许多热心人士捐献文物、艺术品，其创设的目的是为了研究、收藏、展示、教育等功能（《南洋商报》，1972年7月22日）。至于马来西亚在当时是否有民间文物馆，就不太确定。

实际上，国家博物馆不见得完全忽略或不呈现华人文化与历史，国家博物院院长萨哈伦就曾呼吁华社捐献古董，希望充实博物院的华族文化组的内容（《南洋商报》，1970年1月24日），这说明官方机构不至于完全漠视或否定华人文化历史。然而官方在这方面的工作却显然远远不足够。也因此，马华公会才会想要以民间的力量自行创办华人文物馆，弥补官方博物馆功能上的不足。值得一提者，周福泰上述这段话，把“华人文物馆”的设立置于“国家文化政策”框架中，而非其对立面或否定面。他强调是由于现行的“国家文化政策”带有种族性偏差，因此民间（华团或华基政党）有义务挺身而出，纠正其偏差，设立文物馆就是一种回应方式。由此我们可以确知，“华社民办文物馆”的构想，在那时代是作为在国家文化政策中保存华人历史文化的一种实践。因此，它虽落入“国家/宰制——民间/回应”的二元框架与模式，却非决然断裂。民间的回应是为了争取纳入国家文化，而非否定国家或国家文化。⁶

马华公会的“华人文物馆”倡议在遭到马来社会舆论抨击后逐渐消沉，却未摒弃，日后仍不时对外发布筹办文物馆的消息（《星洲日报》，1983年6月27日）。1980年代末此建议再次引起社会关注（《新明日报》，1989年11月4日），特别是1990年马华公会领导人把计划升级为筹建“华人文化城”，结果再次挑动马来社会敏感神经，引来强烈抗议，认为“华人文化城”是沙文主义产物，分裂国家团结（*Utusan Melayu*, 20 Mei 1991）。最终马华公会抵不住重重压力，只好草草收尾。

华社对此事的回应与过去一致。当时一位评论人就指出：

老实说，“华人文化城”一方面以华人在我国历史上的贡献作为基调，另一方面也强调突出三大民族携手共进，建设国家的史实，又怎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妨害国家的团结呢？”事实上，正由于国家博物院和各州博物馆在文物收集上存有一些缺憾，对这一部分文物有所忽略，类似“华人文化城”文物馆的设立，正好补其空白，否则，又如何能够真正反映出我国的多元文化色彩呢？

（《南洋商报》，1991年5月12日）

在1980年代，除了马华公会的“华人文物馆”引起社会关注以外，另有两次兴办文物馆的重要倡议值得一提。这两次倡议同样也因为各种内外因素，在当时未能落实。

⁶ 提出这点相当重要，说明在对待国家文化政策的立场上，除了肯定，也可以有否定。这种否定的立场，主要可从2000年后一场牵涉学者庄华兴和黄锦树关于国家文学论争看出，前者主张多语国家文学，后者则批评国家对文学文化的政治绑架，而提倡否定国家文学。相关讨论收录于庄华兴编著（2006）。必须一提的是，在2000年后主张告别国家文学的黄锦树，在1990年代亦曾主张马华文学应透过翻译，纳入国家文学，参见黄锦树（2002）。实际上，在更早前的1990年代初，马来社会就曾掀起“国家文学”是否有必要的争论。马来诗人沙烈·本·佐倪（Salleh Ben Joned）与学者依斯迈胡申（Ismail Hussein）曾就此辩论。华社对此事相当关注，做了些讨论与翻译，见沙烈（1992）、陈应德（1992）。这种对待国家文化政策立场的变化，可能说明一点，“国家文化”议题在经过多年消费后，已逐渐消耗殆尽，而出现反弹。可预料，这个新趋势也对2000年左右兴起的民办文物馆起到一些影响。

1983年3月，根据媒体报导，由雪兰莪惠州会馆和叶氏宗祠计划筹建的叶亚来纪念堂，注册经已获得政府批准，随时可开工兴建（《建国日报》，1986年3月3日），然而好事多磨，直至三十余年后的2018年，该纪念堂仍处于筹备阶段。⁷值得一提者，设立叶亚来纪念堂的原初目的，是为了回应马来学界与官方自1980年起，对叶亚来作为吉隆坡开埠功臣的说法予以否定和质疑。⁸

另一次兴办民间文物馆的倡议，声势并没前两次浩大，却也相当重要。1985年12月18日，华教运动重要领袖林连玉辞世，其身影在媒体与舆论拉拔下越形崇高。他故后几日就有人提出“发扬林连玉精神”、“建立林连玉铜像”（《南洋商报》，1985年12月21日）。犹有近者，有人进一步倡议建立林连玉纪念馆。当时全国教师总会副主席席庭谕对媒体坦言，虽然教总有意立馆，却碍于客观条件，恐难成事（《通报》，1985年12月25日）。无论如何，在各方人士多年的努力后，林连玉纪念馆终于在2013年建成并启用，由林连玉基金负责营运管理。

以上三次“民办文物馆”倡议，相信并非1980年代时华社仅有的文物馆构想，但它们都引起华社高度重视，值得我们关注。华社——无论是政党（马华公会）或传统华团（雪兰莪惠州会馆、叶氏宗祠、林连玉基金）虽然在提出构想后获得民意普遍支持，却因为各种条件不具足未能实践，令计划仅能停留在构思和倡议阶段。箇中因素复杂，无法详述，概括而言，政治因素（马来社会反对）、文物保存观念薄弱、史料挖掘工作不足⁹等都是成因。这都说明彼时华社虽已形成“民间文物馆”观念，却仍缺乏相关的物质条件。

再者，在华社引起关注的“民办文物馆”构想，往往是出于历史文化忧患意识，且站在全体华社立场出发，捍卫华社利益，融入国家主流，而非否定国家，也非选择自我放逐。因此，马华公会“理想中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城所展示的内容，将以华人文物为主，并进行研究、整理和展示华人各层面的文化，为华人文化汇聚一个中心。”（《新明日报》，1991年5月20日）换言之，“华人文物馆/文化城”的对象与目标，是以全体华人为一个单位，加强族内凝聚力，然后在国家文化中寻求承认与定位。

⁷ 叶亚来纪念堂的筹备失败，原因不详。依观察，应非政治干预，而是其他因素所致，因为雪州政府在1990年于沙登（距离吉隆坡约30公里）拨出两万方尺的土地予以兴建叶亚来纪念堂，结果却没了后续。见《通报》（1990年5月28日）的报导。

⁸ 相关新闻报导，见《星报》（1983年10月28日）、《建国日报》（1986年3月3日）、《中国报》（1989年9月4日）等。

⁹ 1984年3月，马六甲中华总商会接受马六甲博物馆献议，在馆内协助设立华人文物馆，表扬华人对马六甲的贡献。然而，该项工作却多番延宕。《星洲日报》社论提到：“照总商会原先的打算，除了先贤烈士等的照片之外，所搜集的文物，也包括纪念碑、墓志、报纸、塑像等。但由于负责人忙于其他事务，加上资料也不是垂手可得，于是工作也就耽搁下来。……由于华族对文物保存的观念薄弱，加上几经丧乱，史料确丧失不少，因此，要着手编写各类历史，不免困难重重。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对史料的发掘，还做得不够。”（《星洲日报》，1984年5月5日）。该社论说明文物保育的观念和技术，在华社都仍处于萌芽阶段。关于华社的文化遗产观念如何在华社形成，参见张集强（2009），该文指出在经历多次在对抗国家过程中，捍卫华人历史古迹事件后，例如捍卫三宝山、柔佛古庙山门、吉隆坡义山等事件，催化了华社的文化遗产观念。本文基本上延续张集强的脉络，并认为民办文物馆构想与文化遗产观念是相辅相成的。

叶亚来纪念堂和林连玉纪念馆的建设理念也大致相同。只是二者皆属人物型纪念馆，其代表性自然难以和马华公会提出的“华人文物馆”匹比。但是在有识之士的努力下，两人都经历了造“神”运动，成为象征华人某种精神的“符号”，从而具备了集体性的代表意义¹⁰。

1980年代初，叶亚来的历史地位面临危机之际，识者就已尝试扩大其集体性的代表意义，强调他不仅代表一个特殊时代、地域与群体，更是在国族理念中有着普遍的代表意义。故此，叶亚来不仅是叶氏家族成员或19世纪吉隆坡的开埠功臣，更是全体华人代表、马来西亚的重要人物。¹¹为扩大其影响力并提升其历史地位，识者进一步尝试透过仪式来打造叶亚来这个民族符号。1987年，有人倡议将叶德来（即叶亚来）诞辰列为华社重要节日，“以作为团结一致及其后代对民族历史更有一份自信心和自豪感的促进步骤。”（《南洋商报》，1987年3月8日）将伟人诞辰仪式化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族群凝聚力，但叶亚来却是个失败尝试。一般民众对叶亚来的追思日反应冷淡，即便其后裔也不太热衷（《星洲日报》，1994年3月19日）。

相反地，林连玉的符号创造则是个成功案例。¹²林氏辞世后被封为“族魂”，他的忌日是“华教节”，每年定期举办公祭以表哀悼致意，这种种都是凝聚与复习团结意识的重要仪式¹³。林连玉也成功被建构成华社对抗国家单元主义的符号，深埋于马来西亚华人的集体记忆。根据报导，在林氏辞世26年后的2011年，仍有464个团体、约600人参与公祭（《星洲日报》，2011年12月19日）。因此，林连玉精神的符号足以涵盖全体华社，而不仅仅是其个人，也不仅仅是华文教育，而是华族之魂。

以上所见，华社“民办文物馆”最初蕴含的政治意义，是在主流华社对抗国家文化政策的过程中形成，因此是一种文化反抗，透过民间公共舆论形成论述，并在合乎法规情况下实践，以影响国策。然而，如前所述，这种对抗并非否定国家，也未超越国家文化范畴，而是在其中纠正偏差，寻求融入国家文化主流，形成多元主义的国家文化。

¹⁰ 参见林开忠（1999：第五章）的讨论，作者从建构论角度，认为叶亚来和林连玉的历史意义是华社回应国家而建构出来。

¹¹ 在谈到叶亚来纪念馆时，《南洋商报》社论指出：“这是华人社会盛事，相信各方面将会抛开省籍观念，同心一德，共襄盛举。我们并不是把叶德来视为惠州人而已，也不只是华人而已。他是马来西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一位甲必丹，曾经与马来统治者并肩作战，是一位马来西亚人，马来社会也一样对他感兴趣。”（《南洋商报》，1984年5月1日）。

¹² 必须指出华社内部对于林连玉的“造神”有颇多不同见解。林氏在世时一般人都称呼他为“先生”，辞世后初期被升格为“导师”。当时一位署名如林的读者发表文章指出：“不要称呼林连玉为‘导师’……像他这样一个朴实的人，我们给他一个朴实的‘先生’的称谓，不是更好么？”（如林，1986）。此文作者显然反对“神化”林连玉，希望保存其朴实一面。然而，对于造神，林连玉纪念馆馆长徐威雄有不同见解，他认为林连玉的历史贡献确实具有代表性，因此封族魂、设华教节、办公祭、立纪念馆等，都是名副其实（《东方日报》，2011年11月29日）。实际上，就纪念馆所呈现的内容来看，负责单位相当重视林氏的生活面，并未特别将他神圣化。此外，创造林连玉这个“抗争者”符号，对于华教运动的持续与传承，都有策略上的必要。

¹³ 相关详情，参见《南洋商报》（1985年12月21日）、《通报》（1985年12月24日）、《南洋商报》（1986年6月27日）等报导。关于华社对林连玉的造神讨论，参见林开忠（1999：第五章）。

（二）文化村作为临时展示空间

尽管在1980年代，作为一种社会集体行动的呼吁，“民办文物馆”在华社得到各界认可，却因条件不成熟，未能实现。但是，华社在当时也并非一事无成。

1980年代初，华社开始检讨国家文化政策，并发表若干重要文件，包括《文化大会宣言》、《华团国家文化备忘录》、《全国华团联合宣言》，企图与国家对话。1983年，全国十五华团领导机构成立全国华团文化工作委员会，并于1984年开始举办“全国华团文化节”¹⁴，规定每年由不同州属轮办。尽管文化节的重点项目多属表演性质，如文化大汇演，但在实质内容上都有突破之处。

第一届文化节于1984年举办，此后每年一届，由各州轮流负责。展览是文化节的其中一个活动项目，起初几届的展览主题并不怎么亮眼，如民间习俗展、书画篆刻展、华族文化摄影展等。直至第六届文化节，展览内容得到大幅度提升，主办单位设立了“文化村”，并邀请多个团体参与布展，如大马华文作协负责“马华文学展”、雪华堂文教组负责“美术邀请展”、大马华人文化协会负责“书展89”、《南洋商报》负责“马六甲历史资料图片展”、华校教师公会负责“甲州华小史料展”等。文化村作为一个临时性的展馆，从展出内容来看，已具备“民办文物馆”的雏形。

第六届文化节的“文化村”展览也同时配合其他活动进行，如诗歌朗诵、讲座等，取得空前成功。当时有位署名小风的作者，认为“以展览、演出、讲座及出版，互相配合的文化活动，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目的与效果，意义深长，影响力很大。这无疑是本届文化节最成功的一环，值得来届各主办当局参考与仿效。”（《第六届全国华团文化节纪念特刊》1989：91）

自第六届文化节的创举后，往后每届主办单位都设立文化村，并依各州的独特历史与地方特性来规划展览主题。以下整理其中几届展览资料，以便讨论¹⁵：

年份	展览项目（括号内为负责单位）	备注
第五届 (1988)	书画篆刻展、华族文化摄影展	主办单位：柔华堂 (柔佛中华总会)
第六届 (1989)	马华文学展（大马华文作协）、美术邀请展（雪华堂文教组）、第二届马新书法交流展及古城书法荟萃（孔教会、大马书艺协会）、书展 89（大马华人文协）、马六甲历史资料图片展（《南洋商报》）、历史文化资料展（《星洲日报》）、马六甲华人社会的过去与现在展（《中国报》）、文化是民族的根（《马来亚通报》）、大马华人文化及马六甲史料展（《新明日报》）、中国名画义卖展（诸家）、茶艺展（兰亭雅集）、华族乐器展及乐器师范（同安金厦会馆、晋江、培风中学、潮州会馆花乐队）、甲州华小史料展（华小教师公会）	主办单位：甲华堂 (马六甲中华大会堂) 展览内容数量和质量大幅度增加，包括加入主办州属马六甲的文史资料展、书法、华乐、茶艺等。

¹⁴ 关于文化节的讨论，见黄文斌（2009），该文粗略地整理了历年资料，并指出文化节直至1990年代开始，渐渐获得官方认可，因为自那时起，马来裔国家领导人开始成为活动的受邀嘉宾。从这一点来看，1990年代的政治风气确实跟1980年代的压抑相当不同。这对日后文物馆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关于这点下文会进一步讨论。

¹⁵ 相关资料整理自《第五届全国华团文化节特刊》（1988）、《第六届全国华团文化节纪念特刊》（1989）、《第七届全国华团文化节》（1990）、《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节资料集》（2001）、《回归历史·再造辉煌：第17届马来西亚全国华人文化节纪念专辑》（2003）。由于这是临时性的展览，我们无从了解当时具体的展览内容，仅能从当时的文字记录窥知一二。

年份	展览项目（括号内为负责单位）	备注
第七届 (1990)	家乡风味美食义卖（森华堂妇女组）、中国药材与本地生草药展与讲座（森中医中药联合会）、书画文化展与讲座（？））、五家报章新闻图片展（《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新明日报》、《中国报》、《通报》）、马华文学展与讲座（大马作家协会）、森州华人史料展（陈志安）、叶亚来史料展（华社资料及研究中心）、森州华人（校）史料展（森董联会）、日治时期森州华族蒙难史料展（邱金福）、书展（朱芳俊）、茶艺与讲座（郑桂源）、灯笼展、盆栽比赛与展出、手工艺中心、芙蓉中华中学书画纪念品义卖。	主办单位：森华堂（森美兰中华大会堂） 内容比上届更多样化，包括美食义卖、盆栽园艺等。
第八届 (1991)	手工艺品展、叶亚来史料展、丁州华裔史料展、丁州天然风光展、丁州华小史料展、华文报图片展等。 丁州华裔史料展包含14个项目，包括甲必丹史料、头家史料、华人古庙、珍贵古物、乡团史料、新村史料、漳州漳浦县湖石乡林氏始祖移居丁州史料、高氏族谱、妇女服装、安南粽子等。	主办单位：登华堂（登嘉楼中华大会堂） 设有丁州华裔史料展。
第十届 (1993)	国父馆/首相馆、巫印泰艺术展览馆、吉打州华堂史料/吉打华校/华团史料/吉打州华巫作家史料展、全国独中资料展、华人文化节图片展、吉打布秧河谷史料展、三宝山史料展、叶亚来史料展、各语文报社发展资料、马华文学史料展等。	主办单位：吉华堂（吉打华人大大会堂） 多元族群内容，如首相馆、巫印泰艺术展览馆。
第十七届 (2000)	在南方学院设立20个展览馆，包括书画、茶艺、相声、报业史料、百家姓、吉兰丹文物资料、吉打州史料馆等。	主办单位：柔佛中华总会 主办方公开呼吁创办华人文物馆。

从以上内容来看，虽则每届文化村的展览内容多有不同，但大体可看出当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所谓普遍性，指的是其不分地域区别、由全马华人共享者，如马华文学展、书画展、茶艺展等；或者建构全马华人共同的身份象征者，如叶亚来史料展、三宝山史料展等。另一方面，它也带有特殊性内容，比如丁州华小史料展、吉打州华堂史料展、高氏族谱、漳州漳浦县湖石乡林氏始祖移居丁州史料等，这些内容带有地方性或个别家族的性质。

与前述几次出现的“民办文物馆”倡议只停留于构思与倡议阶段不同，文化村展览项目，让华社有机会真正落手落脚去搜罗史料、设计展览内容，从而也发现自身的不足。此外，这种展览与民间举办的一般展览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纯为展示、教育，其背后还有着明确的政治动机，也就是跟国家政策进行对话，因此这是华社集体行动的一种实践，必须置于上述“国家/宰制-民间/回应”二元框架与模式看待。换言之，它是华社欲透过文化活动，在国家文化的范畴内捍卫自身文化传统，并寻求国家认同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

华团在负责展览工作时面对的各种困难，可举第七届文化节为例说明。第七届文化节的文化村设于芙蓉中华中学，其中一个展览项目是森美兰州华人史料展。负责人

在被委任后马上着手蒐集资料，却发现森州华人史料严重散佚。“那些过去对华社有贡献的人士早已身故，他们的后代都没有好好地保存各种记载，再加上日治时期许多宝贵图片资料被摧毁及散佚。因此，要展开这项工作，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需要动用好一些人力、物力及财力。”（《第七届全国华团文化节》1990：47）

面对各种困难，负责人只好四处取经，包括参访新加坡宗亲会馆联合会举办的“华人传统展览”，并获得新加坡口述历史馆助理馆长林孝胜、新加坡国家档案局高级行政人员林源福等人提供意见（《第七届全国华团文化节》1990：47-48）。

正是这种实际操作，令各州华团与民众，在一次又一次轮办文化节的过程中，不仅接纳了“民办文物馆”观念，也进一步地积累“文史保育”的知识与经验。尽管日后华团在创办各自的文物馆时仍常面对搜罗文物等问题¹⁶，但此前的实践都能提供更多应对的装备和支援，各团体之间也能互相借鉴、观摩或参照。

2000年第十七届文化节，主办方柔佛中华总会会长曾振强在致开幕词时，倡议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简称华总）推动设立“华人历史文物馆”或“华人文化与历史研究基金”，以便让年轻一代认识先贤贡献与艰辛。这样的呼吁已非第一次，早在1996年马华公会属下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秘书郭仁德¹⁷，在多年奔走各地筹建华人文物馆不成之后，亦曾呈交备忘录给华总，建议华团创办文物馆（《星洲日报》，1996年11月18日）。该建议最终被纳入《全国华团文化工作总纲领》¹⁸。

马华作家洪祖秋呼应曾振强的倡议，并分享了他参观文化村展览的感想，认为临时性的展馆实不足以满足参访者需求。

最近，我特地到配合第十七届全国华人文化节而设于南方学院的文化村参观，从底层的民间小食，到三楼的华人历史展，一楼一楼的参观，感觉到展出的项目相当的丰富，内容也非常的充实，心中很是高兴。可惜的是，由于时间限制，我只能走马看花，囫圇吞枣，没有时间消化或作笔记。这时我想，如果这些展出的文物能够收集在一个地方，让有兴趣的人慢慢参观、阅读，甚至研究，那该多好。

（《第17届马来西亚全国华人文化节纪念专辑》2003：198）

总的来说，无论是当初兴办文物馆的倡议，还是华人文化节文化村的实践，对全体华社乃至华团，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许多后来参与设立文物馆的负责人，都曾经投入文化村的工作。例如，积极推动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2010年开幕）的文化人

¹⁶ 比如大同历史文物馆在2002年开幕后却迟迟因为史料收集不足而延迟开放，说明民办文物馆所面临的挑战与困难，相关报导，见《星洲日报》（2002年8月16日）、《南洋商报》（2004年7月5日）。

¹⁷ 马华公会多年来透过文协（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进行文化活动，创办华人文物馆是该组织自1980年代以来的计划，却多次遭到政治干预而失败告终。关于这方面前文已有所述，在此不赘。

¹⁸ 总纲领第6.7项：“设立华人文物馆：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目前正在筹备一个华人文化中心，包括华人文物馆在内，全国华团应支持华人文物馆的设立，借以表扬华人爱国的光荣传统，反映华人对促进社会发展的各种功绩，让世人明白华人对国家的贡献，作为华族在马来西亚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见证。”（姚新光编 2001：257）。

陈再藩，本身就是文化节的常年参与者。又比如，森华堂华人文史馆筹委会主席陈嵩杰，过去就曾担任第七届文化节森州华人历史图片资料组副主任。因此，文化村作为临时性展馆，对华社文史工作者无疑是个学习良机，对日后兴起的“民办文物馆”风气都起到一定作用。

此外，早在1980年代起便不断有个人或团体呼吁以民间的力量创办华人文物馆，但这个“愿景”却必须在二十多年后才真正实现。尽管在这过程中，马来西亚也曾出现一些以华人为主题的文物馆，例如陆佑故居“东兴园”曾被商人林国荣购下，并打造成画廊与古董文物馆（《光明日报》，1996年4月4日）。更早之前，也有财团在马六甲设立峇峇与娘惹文物馆。然而它们的存在却似乎未曾引起华团注意，也没起到任何推波助澜的作用，箇中原因难以确定。一个揣测的答案，也许是因为相关文物馆的民间性质，趋向于商业模式，而非多年来华团所追求的文化反抗模式。

三、民办华人文物馆风气的形成及其演变

2002年8月，媒体报导“全马首创的文物馆”即将开幕。这座名为“大同历史文物馆”的民办文物馆，专门收藏和保存一切有关沙叻秀发展期间拥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和物件，同时也记载参与这段历史的有功人士。该文物馆主席龙锦平受访时指出：“这间相信是全马首创的文物馆，将设在大同华小校内的谭公庙……”成立文物馆的三项宗旨，是（一）保存地方历史文物及纪念有功于地方发展之先贤；（二）传承与发扬各族文化，促进亲善交流；（三）启迪新生代了解参与社区的建设发展（《星洲日报》，2002年8月16日；陈永标，2004）。

大同历史文物馆的定位相当清楚，是由“华人性”与“地方性”组合而成。龙锦平在受访中表示，他们希望此次创办文物馆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作用，让其他地区的地方民间组织也能成立类似的文物馆（《星洲日报》，2002年8月16日；陈永标，2004）。

这种抛砖引玉的呼吁，引来多方响应。《南洋商报》读者吴志超指出：“无论成败，第一座地方性的历史文物馆已经正式建立起来，希望全国各州能有更多的热爱华教与对历史有兴趣的朋友，能在原地合力开办地方性的文物馆，不要计较得失，重要的是把先人的血汗遗物收集起来，作为勉励后辈的最佳教材。”（吴志超，2002）

沙叻秀大同历史文物馆的设立也获得在野党政治人物响应，呼吁“各社团兴建地区性的历史文物馆，莫让历史在发展中变得模糊，甚至无从考察。”该区的国会议员郭素沁更指出，此馆是国内首间区域性的历史文物馆，随着该馆的成立，将能带动收藏文物及保留历史的风气（《南洋商报》，2002年9月5日）。

其实，沙叻秀大同历史文物馆并非如宣传所说，是“全马首创的华人文物馆”。资料所见，早在1993年已有砂拉越华族历史文物馆，只不过那并非“民办”，而是“官民合办”，而且该馆在收藏文物资料方面似乎并未得到华社积极配合（《华侨日报》，1994年7月17日）。至于民办的文物馆，在大同历史文物馆之前，已有其他先例，如乌鲁冷岳社区文物馆于2001年创办，之后陆续创办的还有2006年吉隆坡广东义山历史文物馆、2009年巴生客家文物馆、2012年沙登民间故事馆、2013年林连玉纪念馆等（详参附录）。这些早期创办，尤其是千禧年左右出现的文物馆，成为日后其

他社团或有心人士学习与仿效的对象（刘崇汉，2002；戴荣俊，2003）。华社的正面态度，媒体乐于报道宣传，终让“华社民办文物馆”形成滚雪球效应，在全马遍地开花。

民办文物馆风气成形，不仅是滚雪球效应，还有诸多复杂因素。远因是如前文所述，在国家文化政策推出以后，引发华社的民族自强运动，马华公会的“华人文物馆”、雪兰莪惠州会馆与叶氏宗祠的“叶亚来纪念堂”、林连玉基金的“林连玉纪念馆”、历届文化节的“文化村”，都在此列。华社在倡议和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累积和深化历史古迹保护观念、加深对文物馆的认识，尤其重要的是，建立与深化民办文物馆的共识与观念。其他因素，则包括发展主义导致文化古迹面对威胁、国外经验输入的影响等。值得注意者，率先成功的文物馆多是带有地方性质、规模较小者，这多少降低设立文物馆的门槛，在经济、内容展示上，都较容易掌握。

为何此前无法办成，如今却遍地开花？除了民间华社的能力、共识、经济等条件具备以外，此时国家的文化政策也有舒缓的迹象，民办文物馆并未引来“破坏国民团结”或“违背国家文化政策”的指控。此外，文物馆或故事馆也在海外渐渐普遍起来，不排除马来西亚的风气，多少受到国外经验的借鉴和知识技术转移的影响。

何以早期华人文物馆在国内是个敏感课题，以致引来马来社会舆论反对，而今却不见抗议声音？可能跟几个因素有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氛围的舒缓。1990年代之后，随着国内外政经局势变化，比如全球化浪潮、2020宏愿的提出等，都改变了备受压抑的政治氛围，而呈现文化小开放局面¹⁹，华社也不再具有强烈的感时忧族情绪，悲情色彩渐渐淡去。这个大氛围变化直接影响民办文物馆的内涵，其性质和意涵已不能再简单地置于“国家/宰制-民间/回应”二元框架中理解。

换言之，近年兴起的民办文物馆风气，固然与华社多年来不断深化的观念有关，但其背后的驱动力不再以纠正国家文化政策偏差为主要目的，而是有更多复杂的因素，这包括了创办人的地方性诉求、对发展主义的控诉等。这也意味着，“民办”的政治意涵已经转向多元多样化。²⁰

以沙登民间故事馆为例，该馆坐落于雪兰莪沙登新村的沙登华小一校，是华社民办文物馆文化现象下创办的一个展示空间。该故事馆着重对话的，并非国家政策，而是新村里的地方故事。馆内展示内容从“沙登”名称说起，然后涉略新村历史、建筑、基建发展、经济命脉（橡胶业和锡矿业）及教育概况等。沙登新村以华人占多数，当中又以客家人为大宗。因此，馆内格外强调客家元素。

¹⁹ 兹举数例说明小开放情况。在1980年代，华社为了解决华校生在国内升学问题而倡议创办独立大学，却遭到政府反对。但是在1990年代之后，随着教育私有化趋势，华社得以创办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等民办华人学院。另，2002年，政府甚至主动提议筹办华人文物馆，根据新闻报导，雪州博物馆理事会曾献议收购乌雪叻思著名古迹陈文晟大观园，改建为雪州首个华人文物馆（《南洋商报》，2002年5月2日），唯此事至今没有下文。无论如何，这种种都说明，1990年代之后，政府对各族文化采取相对开放态度。这种变化，一方面固然与国内政局有关（捞取华裔选票），同时也跟全球化的大环境（新自由主义的扩散）脱离不了关系。毫无疑问，文化小开放影响了华人的情感，文化氛围也不再如过去般压抑。

²⁰ 当然也有不少民间文物馆仍延续1980年代的架构，林连玉纪念馆便是例子。馆内的林连玉全身塑像的巧妙设计，有着强烈的“国家/宰制-民间/回应”的隐喻，关于设计概念，参见张集强（2014）、蓝氏君与杨两兴（2015）。

笔者在2019年1月参与沙登民间故事馆导览活动时，深刻感受到导览员的客家人情怀。在该次导览活动结束后，导览员特别安排一场由年轻人参与演出的客家山歌表演，其中的传承意味相当明显。导览员在过程中再三强调“我们沙登人”，向在场的外地人凸显其地方认同。这种透过“籍贯”与“地方”建立起来的沙登华人身份，不能纯粹置于“国家/宰制-民间/回应”框架与模式中解读，而必须同时从“地方认同”框架中加以辨认。

进一步来说，尽管故事馆负责人可能并无此意，但客观上，其所提倡的“沙登华人身份”（地方认同），其实是对独立建国以来华人民族主义的一种微妙回应，后者由于强烈的感时优族意识，强调华人的凝聚力、同质性，因此华人的共同语“华语”必须置于优先位置，以致方言不断地遭到边缘化，许多弱小方言，如海南话、潮州话、客家话等，在近几年都面对断层危机。沙登民间故事馆固然并非反对华语，但其客家话情怀，恰是对不断扩张的华语，作出一种传承文化的自觉反应。

换句话说，华社民办文物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精神的历史根源虽可追溯至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以及1980年代前后华社的提倡与实践，但是，由于各种内部的观念或外部的结构因素的复杂演变，文物馆不能再简单地视为国家文化政策的对应产物，而跳脱出“国家/宰制-民间/回应”的框架与模式。

四、结语

本文透过报刊、特刊的整理，指出华社兴起自办民间文物馆，作为一种社会集体行动，此构想是源自1980年代华社为了回应1971年国家文化政策而孕育的。其诉求对象以及运作模式，都受制于“国家/宰制-民间/回应”的框架。无论是马华公会的“华人文物馆”、叶氏宗祠与雪兰莪惠州会馆的“叶亚来纪念堂”或者林连玉基金的“林连玉纪念馆”，都是集结华社力量，对国家进行文化反抗的一种社会集体行动。然而，基于各种内外条件的不具足，这些构想都未能在那个年代落实。反之，华社透过每年在各州轮办的文化节，累积了宝贵的展览经验。无论如何，民办文物馆的构想与观念，正是在上述的倡议、实践不断在华社中深化、巩固、蔓延。

大约千禧年前后，民间文物馆开始大量出现，并在华社促成一股风气。根据资料显示，在短短十余年间，至少有近60间文物馆在全马各地开设。由于资源不足或其他困难因素，这些文物馆的素质良莠不齐，是否真能彰显文物馆的展示、教育、典藏、研究等功能，都相当可疑。无论如何，这些文物馆并非零星、偶发的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现象，背后有着华社共享的情感结构。此情感结构的历史根源来自于1970年代起的土著主义政策对华社造成的制度性边缘化。换言之，这个历史的精神结构形塑并深化了华社的“民办文物馆”观念。因此，“民办”的意义，正在于它站立在国家的另一面，尝试透过民间的努力，影响国家的文化建构，保留与传承华社的记忆。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1990年代中末以后出现的民间文物馆，并不能简单地置于上述“国家/宰制-民间/回应”的框架与模式看待。随着1990年代的文化小开放、资本主义全球化等各种因素，相对于过往的压抑，千禧年期间的华社氛围已相当不同。此时民间文物馆的文化反抗对象，不再限于“国家”，而必须置于一个更多元复杂的架构中理解。

附录

表1：华人民间文物馆简表（截至2019年3月）

序号	开放年份	馆名	州属/地区
1	2001	乌鲁冷岳故事馆	雪兰莪
2	2002	沙叻秀大同文物馆	吉隆坡
3	2003	吉隆坡尊孔独中校史馆	吉隆坡
4	2006	广东义山历史文物馆	吉隆坡
5	2009	巴生客家文物馆	雪兰莪巴生
6	2012	沙登民间故事馆	雪兰莪沙登
7	2013	马来西亚陈嘉庚纪念馆	吉隆坡
8	2013	茨厂街乡音馆	吉隆坡
9	2013/12	林连玉纪念馆	吉隆坡
10	2014/10	陈洛汉纪念馆	吉隆坡
11	2016	吉隆坡客家河婆文物馆	吉隆坡
12	2016/06	巴生福建会馆历史走廊	雪兰莪巴生
13	2018/02	双溪毛糯麻风病院故事馆	雪兰莪双溪毛糯
14	2018/03	华人博物馆	雪兰莪沙登
15	2018/04	巴生兴华中学人文走廊暨校史馆	雪兰莪巴生
16	2018/06	陈氏书院文物馆	吉隆坡
17	2019/01	隆雪中总领航馆	吉隆坡
18	2001	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	槟城乔治市
19	2002/11	槟城孙中山纪念馆	槟城乔治市
20	2003	槟城韩江华人文化馆	槟城韩江学院
21	2004	槟城娘惹博物馆/侨生博物馆	槟城乔治市
22	2009	马来西亚客家文物馆	槟城
23	2013/10	槟城家具文物馆	槟城北海
24	2014/11	槟城殖民博物馆	槟城乔治市
25	1995	霹雳洞中山文物馆	霹雳
26	?	甲板文物展示中心	霹雳
27	2009/04	务边文物馆	霹雳务边
28	2009	务边怀古楼	霹雳务边
29	2012/10	近打锡矿工业（砂泵）博物馆	霹雳近打
30	2014/02	太平老厝博物馆	霹雳太平
31	2015	闲真别墅	霹雳怡保
32	2016/12	七条路文物馆	霹雳实兆远
33	2018/09	实兆远垦场博物馆	霹雳实兆远

序号	开放年份	馆名	州属/地区
34	1998	马六甲培风中学校史室	马六甲
35	2006/06	马六甲郑和文化馆	马六甲
36	2013/07	沈慕羽书法文物馆	马六甲
37	2016/09	马六甲洛阳印务局	马六甲
38	2006	金马士红楼四馆	森美兰金马士
39	2013	武来岸石拿督庙文物馆	森美兰武来岸
40	2009	南方大学学院丹斯里拿督张愈昌文物与艺术馆	柔佛士古来
41	1997	宽柔中学文物室	柔佛新山
42	2009/10	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	柔佛新山
43	2010/10	新山广肇会馆文物馆	柔佛新山
44	2015/02	林家吉乡音馆	柔佛昔加末
45	2007	柔佛古庙文物室	柔佛新山
46	?	黄梨博物馆	柔佛笨珍
47	2010	新山福建会馆文物室	柔佛新山
48	2016	麻坡中华中学校史馆	柔佛麻坡
49	2019/01	麻坡广肇文物馆	柔佛麻坡
50	2015/01	居銮福建会馆历史文物馆	柔佛居銮
51	2016	柔佛州河婆文物馆	柔佛古来
52	2013/09	瓜丁德顺文物馆	登嘉楼
53	2017/07	文冬文化馆	彭亨文冬
54	2004	世界福州十邑文物馆	砂拉越诗巫
55	1993	砂拉越华族历史文物馆	砂拉越古晋
56	2008	诗巫刘钦侯医院纪念馆	砂拉越诗巫
57	2010/02	诗巫卫理文物展览馆	砂拉越诗巫
58	2011/06	诗巫海内外张氏文物馆	砂拉越诗巫

* 本附录由邓婉晴参考林连玉基金《马来西亚华人民间文物馆通讯录》以及各媒体报道整理而成。

参考文献

- Abu Talib Ahmad 2015. *Museums, History and Culture in Malaysia*, Singapore: NUS Press.
- 安焕然、何朝东编，2010，《老东西也能跳舞：文物馆经营管理研讨会文集》，新山：南方学院与新山中华公会辖下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
- 陈亚才，2010，〈就地取材，苦心经营——大马华人民间文物馆的综合观察〉，安焕然、何朝东编，《老东西也能跳舞：文物馆经营管理研讨会文集》，新山：南方学院与新山中华公会辖下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2010，页65-78。
- 陈应德，1992，〈民族斗士可以休矣〉，《星洲日报》，1992年3月29日。
- 陈永标，2004，《饮水思源、把根留住：沙叻秀大同历史文物馆创办前后（2001-2004）》，出版资料不详。
- 戴荣俊，2003，〈成立社区文物资料中心的意义〉，《星洲日报》，2003年1月30日。

- 《第五届全国华团文化节特刊》，1988，新山：柔佛州中华总会。
- 《第六届全国华团文化节纪念特刊》，1989，马六甲：马六甲中华大会堂。
- 《第七届全国华团文化节》，1990，森美兰：森州中华大会堂。
- 《东方日报》，2011年11月29日，〈透视林连玉纪念馆，纪念馆“活化”林连玉精神〉。
- 《东方日报》，2016年10月24日，〈走进文物馆：民办展馆主动出击！〉。
- 《光华日报》，1981年9月17日，〈针对抨击马华设立华人文物馆事，全国马青总秘书周福泰发表文告，非议前锋报社论已抵触国家宪法〉。
- 《光明日报》，1996年4月4日，〈古董文物·琳琅满目，东兴园满室艺术香〉。
- 《华侨日报》，1994年7月17日，〈无人乐意提供展出，砂华族历史文物馆，缺乏文物史料〉。
- 黄锦树，2002，〈“马华文学”全称之商榷——初论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张永修、张光达与林春美编，《辣味马华文学：90年代马华文学争论性课题文选》，2002，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页3-17。
- 黄文斌，2009，〈华人与国家文化建设：以全国华团文化节为例案研究（1984-2005）〉，文平强、许德发编，《勤俭兴邦——马来西亚华人的贡献》，2009，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页121-134。
- 《回归历史·再造辉煌：第17届马来西亚全国华人文化节纪念专辑》，2003，新山：柔佛州中华总会。
- 《建国日报》，1986年3月3日，〈吉隆坡开埠功臣叶亚来纪念堂注册获准，推动兴建工作，官民责无旁贷，写于甲必丹叶公亚来一百四十五周年诞辰〉。
- Kementerian Kebudayaan, Belia dan Sukan 1973. *Asas Kebudayaan Kebangsaan*. Kuala Lumpur: Kementerian Kebudayaan, Belia dan Sukan.
- 蓝氏君与杨两兴，2015，〈牵动时代巨轮——展示空间设计概念〉，《林连玉纪念馆通讯》，2015年1月，页4-6。
- 李金韵，1991，〈关于“华人文化城”争论〉，《南洋商报》，1991年5月12日。
- 林开忠，1999，〈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林连玉纪念馆通讯》编委会编，2014，《2014年华人民间文物馆交流会》（未出版）。
- 林源福，2010，〈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的建设与营运经验〉，安焕然、何朝东编，《老东西也能跳舞：文物馆经营管理研讨会文集》，2010，页56-64。
- 刘崇汉，2002，〈文化建设与创新思考〉，《星洲日报》，2002年12月23日。
- 陆庭谕，1989，〈速建叶亚来纪念馆〉，《中国报》，1989年9月4日。
- 《南洋商报》，1933年1月28日，〈华侨联合会：筹设华侨文化馆；设立华侨子弟学校；宣传华侨生活状况〉。
- 《南洋商报》，1970年1月24日，〈博物院院长吁华族人士；捐献古物俾充实华族文化组；经济陈列馆今年底完成〉。
- 《南洋商报》，1972年7月22日，〈南大李光前文物馆隆重举行开幕典礼；文化部长易润堂主持仪式致词；继续强调新加坡人民独立性格〉。
- 《南洋商报》，1984年5月1日，〈从叶德来纪念馆说起〉。
- 《南洋商报》，1985年12月21日，〈副教长林良实指出，林连玉在华教史上将占一席重要地位，陈庆佳建议为林老建立铜像〉。
- 《南洋商报》，1986年6月27日，〈林连玉墓，不久招标建筑，三个月后完竣〉。
- 《南洋商报》，1987年3月8日，〈叶瑞青说有助促进认识民族历史，建议将叶德来诞辰列为华社重大活动〉。

《南洋商报》，2002年5月2日，〈雪州博物院相中叻思古迹，大观园辟华人文物馆〉。

《南洋商报》，2002年9月5日，〈记载先人功绩，设文物馆见证历史〉。

《南洋商报》，2004年7月5日，〈史料收集不易，大同文物馆展延开放〉。

丘如华，2010，〈观光与经营的省思——从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谈起〉，安焕然、何朝东编，《老东西也能跳舞：文物馆经营管理研讨会文集》，2010，新山：南方学院与新山中华公会辖下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页1-9。

如林，1986，〈向林连玉基金委员会进一言〉，《南洋商报》，1986年2月7日。

沙烈·佐倪，李亚遯译，1992，〈不是运动，也不是阴谋〉，《星洲日报》，1992年3月19日。

《通报》，1985年12月24日，〈林连玉教育基金应仿效诺贝尔奖，每年颁发一至两份褒扬华社精英功绩〉。

《通报》，1985年12月25日，〈华教斗士逝世，精神永留人间，纪念林连玉建议甚多，教总有意设立纪念馆〉。

《通报》，1990年5月28日，〈叶炳汉：政府拨地两万方尺兴建，甲必丹叶亚来纪念堂将矗立在沙登市〉。

Utusan Malaysia, 14 September 1981. “Muzium Kebudayaan Cina?”

Utusan Melayu, 20 Mei 1991. “Chinatown: MCA Jangan Keterlaluan”.

吴志超，2002，〈建立地区文物馆〉，《南洋商报》，2002年8月29日。

《新明日报》，1989年11月4日，〈文协新领导曾积极展开华人文物馆筹建工作〉。

《新明日报》，1991年5月20日，〈出版华人文化城手册，全盘阐释概念宗旨〉。

《星报》，1983年10月28日，〈陆庭谕吁华社正视开辟吉隆坡功绩地位，历史试题否定叶亚来，今年五年级检定考试〉。

《星洲日报》，1983年6月27日，〈大马华人文化协会，将设立一个理事会，商讨设立中华文物馆及图书馆〉。

《星洲日报》，1984年5月5日，〈从华人文物馆延期开幕谈起〉。

《星洲日报》，1994年3月19日，〈叶亚来追思日，一年不如一年〉。

《星洲日报》，1996年11月18日，〈文协建议华团，设华人文物馆〉。

《星洲日报》，2002年8月16日，〈全马首创·坐落大同华小谭公庙，沙叻秀文物馆后日开幕〉。

《星洲日报》，2011年12月19日，〈纪念逝世26周年，464团体逾600人祭林连玉〉。

姚新光编，2001，《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节资料集》，吉隆坡：华总全国华团文化咨询委员会。

叶耿瑾，2010，〈韩江华人文化馆的现状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安焕然、何朝东编，《老东西也能跳舞：文物馆经营管理研讨会文集》，新山：南方学院与新山中华公会辖下新山华族历史文物馆，页56-64。

张集强，2009，〈华人贡献的实证：大马华人文化遗产保存概况〉，文平强、许德发编，《勤俭兴邦——马来西亚华人的贡献》，2009，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页415-443。

张集强，2014，〈林连玉纪念馆的设计概念〉，《林连玉纪念馆通讯》（试刊号），2014年5月，页14-16。

庄华兴编著，2006，《国家文学：宰制与回应》，吉隆坡：雪隆兴安会馆与大将出版社。